

# 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的沿革與新機遇

吳英成

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 [新加坡]

E-mail: [yengseng.goh@nie.edu.sg](mailto:yengseng.goh@nie.edu.sg)

**摘要：**本論文分為八節：第一節從歷史背景與社會語言情境角度，綜述新加坡語言景觀與雙語教育政策；第二節從官方語言、行政語言、族群語言著眼，分析華語與英語在新加坡的社會語言地位；第三節從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外語教學、“母語”的界定、教學媒介語的選擇、語言教育課程的設計等相關領域，分析華語與英語在新加坡的語言教育地位；第四節從官方人口普查數字、教育部華族小一新生家庭常用語統計數字，探討變動中的華族社會：從“脫方入華”至“脫華入英”；第五節從推廣的目標、層面、目標群等，闡述“講華語運動”的成果與未來的走向；第六節回顧過去三次重大的華語教學改革——1992年王鼎昌領導的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1999年李顯龍領導的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2004年黃慶新領導的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並對現行的特選中學、華語B課程進行反思。第七節從新加坡教育部推行的雙語並用華語教學實驗計畫、雙文化課程，探索新加坡華語教學的新方向。第八節從全球語言視角導入，詮釋華語在新加坡的新機遇。

**關鍵字：**語言政策、雙語教育、教學媒介語、全球語言

##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in Singapore: Evolution and new opportunities

Goh Yeng Se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E-mail: [yengseng.goh@nie.edu.sg](mailto:yengseng.goh@nie.edu.sg)

**ABSTRACT :** This paper, comprising of eight sections, offer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in Singapore. Section 1 provides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sociolinguistic profile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of Singapore. Section 2 analyses the sociolinguistic status of English language (EL) and Chinese language (CL) through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official, administrative and ethnic languages in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al status of EL and CL from the linguistic (L1/L2/FL/MT) and pedagogical (curriculum design; language medium of instruction) perspectives is presented in Section 3. Section 4 investigates the 2 phases of the ongoing massive language shif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Section 5 looks at the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through reviewing the objective, scope and target audience during various phases of the campaign. Section 6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3 major CL pedagogical reforms, led respectively by Ong Teng Cheong (1992), Lee Hsien Loong (1999) and Wee Heng Tin (2004), and ongoing changes made to the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AP) school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B” (CL B) syllabus. Section 7 explore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teaching of CL in Singapore by looking 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initiatives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Bilingual Approach (BA) and the Bicultural Studies Programme (Chinese). The final section discusses the role of CL in the Singapore context, i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rom a global language perspective.

**KEYWORDS :** language policy, bilingual education, medium of instruction, global language

### 1. 新加坡語言景觀與雙語教育政策

新加坡由華族、馬來族、印度族三大種族組成多元語言、多元文化的國家，各族人口比例為(Leow 2001: viii)：華族最大(76.8%)、馬來族其次(13.9%)、印度族居末(7.9%)。英語雖然與代表三大種族的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皆為官方語言 (official languages)，但是由於新加坡曾經歷英國長期殖民統治，在政治、經濟、法律等迄今仍沿襲大英帝國體制，因此英語依然是一枝獨秀，作為官方的主導語言(master language)。可見，多元族群和政體特徵對新加坡的語言政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由於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與英語並列為新加坡四大官方語言，國家領導人在許多重要的慶典都會以英語和三大種族的個別族群共同語發表演講。國會議員也可以在國會議以個別族群共同語發言，但畢竟仍屬於少數，大多以英語為交流、辯論的主導語言。總之，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語的社會語言地位並不高，既不是政府部門的行政工作語言，也非政經活動的主要交際語言。這三大種族的個別族群共同語的主要功能是傳承族群文化和維繫族群交流，社經地位遠低於英語。

自新加坡 1965 年獨立建國以來，雙語教育即成為主流教育體系的基石。所有新加坡學生除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外，還必須修讀所屬族群的“母語”課程。新加坡推行以英語為主、族群“母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政策是人民行動黨政府基於國家發展和族群團結所作出的必然選擇。但是，經過 40 多年的推動後，英語不但已成為本地強勢主導工作語言、跨族群語言、“國家語言”，未來還可能取代族群“母語”，成為新加坡學生第一習得語言。

在新加坡的華族社群裏，華族學生必須接受“英文為主，華文為輔”的雙語教育體制，在基礎教育階段修讀十到十二年的華語課程。但相對於英語应用能力，華語在新加坡的教育體系只是單科，教學時間有限，本地學生聽說能力還行，“讀寫能力”卻不斷弱化。

新加坡原本期望在雙語教育制度下，能培養華族學生成為華英雙語同等優異的雙語人才，但從過去四十多年社會語言環境的變遷，教育當局已意識到雙語教育制度是有所局限的。因此，新加坡政府曾三次進行大規模的華語教學改革，除了修訂更接近現實的有效性教學目標，同時為了栽培應付中國崛起後所需的大量華語人才，也在指定的特選中學開設“雙文化課程”。

與其他海外華族學生相比，新加坡學生正規學習華語的時間是最長的，整體水準也比較高。由於新加坡擁有相對優勢的英語和華語應用環境，新加坡華文教師也累積獨特的華語教學經驗，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新加坡教育工作者如果能善加利用自身的中英雙語優勢，仍然大有可為。

## 2. 華語與英語的社會語言地位

### 2.1 華語

新加坡各族群本身並不具有同質性的語言整體，例如馬來族內部有馬來語、爪哇語、波亞語等；印度族內部有淡米爾語、馬拉亞裏語、旁遮普語、錫克語、孟加拉語等；華族的情況更加複雜，除華語外，還有南方漢語方言：俗稱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福州話、海南話等。因此，族群內還需要有一個共同語，扮演聯繫族群、傳播本族文化的角色。在三大族群的個別共同語中，馬來語受認同的程度最高，淡米爾語因為在印度族的語言威望並不高，以致受認同的程度最低。華語作為華族共同語，其地位的確立也經歷漫長的演變過程。

在新加坡立國初期，華人多以祖籍漢語方言為主要家庭用語。後因華語被官方界定為華族唯一的族群“母語”，加上“講華語運動”的成功推行，如今漢語方言在新加坡已幾近滅絕。

華語在各地的名稱與意涵不一。在中國大陸，華語稱為“漢語”，強調其為漢民族的共同語，以區別於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漢語又稱“普通話”，強調此語言的普及通用特質。在臺灣，為強調國家認同，而將華語稱為“國語”。在香港，所謂“中文”乃指當地通用的“粵語”，而華語則跟隨內地稱之為“普通話”。而在多元種族的新加坡社會，因華人以“華族”作為族群的身份表徵，與他族（馬來族、印度族）形成對照，自然把華人的共同語稱為“華語”，以強調海外華人的共同認同。

近年來，中國隨著綜合國力的急升，逐漸從世界的工廠轉型為世界的市場，華語也因此躋身成為僅次於英語的全球第二強勢語言，越來越多外籍人士都以學習華語作為提升自我競爭力的條件。華語在新加坡的主要功能除了承傳華族文化外，也開始顯現其經濟價值，間接地增加本地學生及工作人士學習華語的興趣。

華語學習熱正在全球蔓延，據統計，近年來到中國學習的外國留學生人數每年都以 20% 左右的速度增長，同時目前世界各地已有 2300 多所大學開設華語課程，學習華語的人

數已近 3000 萬。中國政府也加快向外推廣華語的腳步。從 2004 年起，中國開始與外國高校合作成立“孔子學院”，在短短三年裏，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已迅速增加到 132 所。新加坡的華語教學機構也計畫搭上這班全球華語熱順風車，針對各地華語市場的請求，發展出獨特的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策略。

## 2.2 英語

新加坡四大官方語言之一的英語，一直是本地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科技、行政等公共領域的高階語言(high language)與主導語言(dominant language)。無論在私人企業或者行政機構等正式情境，英語都被視為主導的行政語言與工作語言。英語在新加坡具有最高的經濟價值，人們要想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非掌握英語不可。因此，英語也被稱為成功人士的語言。

除此之外，與其他三大種族族群“母語”相比，英語又是一種“中立性”的語言，並為各族群所接受。因此，也自然成為跨族群的共同語。

英語迄今依然一枝獨秀成為官方的強勢語言(master language)並不是偶然的，其中既有早期大英殖民帝國遺留的歷史背景，又有國家獨立後因現實發展和族群和諧共處的考量，成為新加坡政府語言政策的必然選擇。

英語挾著十八世紀大英帝國與廿世紀美國國勢的壯大不斷向全球延伸，如今已成為全球化時代最強勢的國際語言。在學術、教育、資訊、商業、媒體、娛樂、旅遊、科技等領域，英語都發揮著莫大的影響力。以英語為主要傳播媒介的好萊塢電影、網路遊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響著新一代的年輕人。隨著新媒體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英語流利的新加坡年輕一輩接受英美主流文化的速度更是快得驚人。

## 3. 華語與英語的語言教育地位

### 3.1 華語

華語在新加坡目前正處在轉變的關鍵期。華族社群以英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學生比例已超越以華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學生人數，華族家庭常用語“脫華入英”的趨勢已無法扭轉。

在新加坡的教育體系中，主要科目都用英語講授。華語在學校的使用功能受限，學生的華文程度已因而逐年下降。雖然政府一再強調雙語的重要性，但在政策上總是以英語為主，以致華語的社會價值無法得到體現，只能成為文化傳承的工具。

從新加坡年輕華人的語言技能著眼，首先表現在讀寫能力逐漸喪失，許多人已經無法閱讀華文報紙；其次是華語口語表達的流利度下降，華英語碼混雜的情況日趨嚴重。未來最嚴重的情況是華語漸漸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最終淪為通過課堂學習的外語。

華族學生華語能力下降的跡象已經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自 1999 年起，政府開始通過各種新政策，希望遏制華文程度下滑的趨勢。同時政府在四所特選中學開設“雙文化課程”，栽培“雙語雙文化人才”，以期保留擁有英漢雙語的人才優勢。這一系列教育政策的調整，無疑對提升本地學生的華語能力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目前華文科的主要功能是傳播華族傳統文化和價值觀。華文人才的主要出路是擔任華文教師或在少數的政府部門工作。有限的就業管道實在很難吸引學生學好華語。因此當務之急是如何提升華語的社經地位，讓華語成為能讓新加坡學生增值的謀生工具。

學校教育對華文的推動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如果沒有家庭、社會和國家政策的有力配合，華文教學要取得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新加坡政府應該在就業、職務晉升，甚至政府決策等方面賦予華文更多的實用功能，才有可能減緩華文式微的進程。

### 3.2 英語

英語在新加坡教育體制中佔有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英語不僅是所有新加坡學生必修的第一語言，也是數理、人文等其他科目的教學媒介語。同時也是學校正式活動的主導語言。英語成績好，對學習其他科目幫助很大，因此備受教師和學生的高度重視。

英語的教育地位高於華語的主要原因是：在求職就業時，英語的實用價值高，英語已經成為新加坡人工作領域不可少的工具。在可預見的將來，英語獨尊的局面很難改變。

#### 4. 變動中的華族社會：從“脫方入華”至“脫華入英”

從新加坡官方的人口普查數字(Leow 2001)可清楚地看出：新加坡華族家庭常用語言近二十年來處於迅速易位的階段。

新加坡的早期華人移民多來自中國南方，彼此間只能以各自的祖籍方言溝通。新加坡政府為打破華族方言族群的藩籬，自 1979 年起大力推行“多講華語，少講方言”的“講華語運動”。這個成功的全國性運動最終導致以祖籍方言作為主要家庭用語的華族人口，由 1980 年的 81.4% 急劇下降至 1990 年的 50.6% 與 2000 年的 30.7%。與此同時，以華語為主要家庭用語的華族人口則迅速增長，從 1980 年的 10.2% 驟升至 1990 年的 29.8% 與 2000 年的 45.1%。這種轉變清楚顯示：華族家庭用語“脫方入華”的局面已然形成，華人祖籍方言已失去最保守語言堡壘（家庭域）的主導地位，華語“名副其實”地成為新加坡華族的共同語。

然而，華語在華族社群處於主導地位的優勢近年開始面臨英語的挑戰。自 1965 年獨立建國後，因各級學校施行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族群“母語”僅為一門必修科的非平行雙語教育。再加上政府通過行政手段，使英語成為在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科技、行政等領域的高階與強勢語言。無論是在工作場合或行政機構等正式場所，英語都被普遍地應用為主導語言。因此，使用英語的華人呈現穩定增長，從 1980 年的 7.9% 倍增至 1990 年的 19.2%，到 2000 年已達 23.9%。

教育部華族小一新生家庭常用語的統計數字(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04a) 則清楚顯示，未來華族家庭用語正在“脫華入英”。在家講華語的華族小一學生，從 1980 年的 25.9% 增至 1990 年的最高峰 67.9%，隨後便開始逐年遞減，2000 年為 45.4%，2004 年為 43.6%。反觀在家講英語的華族小一新生人數卻不斷向上攀升，從 1980 年的 9.3% 增至 1990 年的 26.3%，到 2000 年升至 40.3%，更於 2004 年以 47.3% 首度超越華語，處於主導地位。

另外，2000 年人口普查(Leow 2001:30)也顯示，年齡介於 5 至 14 歲的華族少年，35.8% 在家講英語，而年齡介於 15 至 24 歲的華族青年，只有 21.5% 以英語為家庭常用語。我們據此可推斷：新加坡華族家庭常用語“脫華入英”的時刻指日可待。

這種“脫華入英”的趨勢，在相差 10 歲的年輕族群間，以超過 10 個百分點的速度推進，雖然目前在新加坡以英語為家庭常用語的華族人口還未超過以華語為主要家庭語言的華人人數，但如果沒有其他變數影響，快則 10 年、慢則 20 年，英語將成為新加坡華族最主要“母語”，而華語則將變成透過課堂學習而來的外語。

#### 5. “講華語運動”

##### 5.1 兩階段的目標

從官方為每年的講華語運動所提出的口號內涵，我們可以看出二十多年“講華語運動”主軸的差異，大致可分為前十年與後十多年兩大階段。

前十年講華語運動的目標，主要偏重在以華語取代方言作為華族的共同語。在未提倡講華語運動以前，新加坡華族社群在非正式場合(例如：家庭、小販中心等)大多講祖籍方言：包括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福州話、海南話等。這些祖籍方言分別隸屬於中國南方方言的閩方言(福建話、潮州話、海南話、福州話)、粵方言(廣東話)、客家方言(客家話)。這三大漢語方言群，彼此之間音韻差距頗大，無法進行口頭語交際。華語作為華族的共同語，自然成為族群內部溝通的唯一工具。

為了打破華族方言音韻藩籬，新加坡政府選擇以世界華人地區使用最普遍的華語作為本地華族社群的共同語，“多講華語，少講方言”成為講華語運動的宣傳主軸。另外，推廣華語運動也有助於雙語教育的施行。新加坡教育部指定華族學生必修的族群“母語”為華語，而非大多數本地華人在家庭所講的祖籍方言。普及華語，有助於營造出華族學生更容易學習華語的語言環境。

不過，這些南方方言在音韻特質上與隸屬北方官話的北京話及其語言變體差異頗大。正因如此，無可避免造成只會講華語或英語族群的年輕人與講祖籍方言族群的中老年人產生語言代溝。另一方面，新加坡本土華語在語法、辭彙、語音方面，都還是無法避免受南方漢語方言群的影響，例如：新加坡華人在學習華語時經常平舌音與捲舌音不分，舌尖鼻

音韻尾與舌根鼻音韻尾相混，尤以潮州人誤讀頻率偏高。加上南方方言都存有短促的入聲調，經常把古入聲字讀成短促下降調，有時也帶有喉塞韻尾，這些差異造就了新加坡華語的本土特色。

在前十年的講華語運動中，政府利用各種大眾傳播媒介，包括報章、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大力宣傳，鼓勵新加坡華人多講華語，營造有利於使用華語的社會環境。為此，政府還採取一系列措施，如逐步淘汰祖籍方言電臺、電視節目，加快製作本地華語電視劇等。當局也鼓勵在招牌上以中文拼音與漢字書寫食物名稱，在為新公司、新生嬰兒取名，以及為新街道和住宅區命名時，都以中文拼音來取代方言拼音。這種種抑制貶低祖籍方言社會地位等做法，讓原來習慣講祖籍方言的中老年華人被迫失去祖籍方言娛樂節目或熟悉的講祖籍方言生活環境，這對他們而言，在情感上是一個痛苦的“失語”過程。

從語言計畫的成效而言，講華語運動無疑是成功的。然而，華語在華族社群處於主導地位的優勢近年卻面臨英語的挑戰。為抑制以英語為主流的西方政治文化在本地影響力繼續擴大，從而避免本地華人喪失自身文化特性，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十多年裏，講華語運動的目標也進行調整，宣傳主軸開始從“少講方言”轉移至“認識文化”，推廣華語委員會主席也改由英校背景者出任，並以英語作為主要宣傳媒介，希望協助接受“以英語為主，華語為輔”雙語教育的新一代華人有效地學習基本華語會話。

因此，前十年的講華語運動偏重在日常生活交際的話題；但後十多年的講華語運動則轉向以認識中華文化為主軸，例如介紹華人的節日風俗，引進中港臺華語電影、華語戲劇相聲等文化性節目。主題則沿用：“講華語，好處多”的口號，海報宣傳也不斷強調華語是優美的、酷的（cool）語言，承傳著豐富的文化、寶貴的傳統。

## 5.2 未來運動方向的改變

從推廣物件和語言使用場合來看，兩個階段的物件並不一致，前十年偏重在居住於政府組屋區的講祖籍方言社群的宣導，宣傳地點主要是講祖籍方言為主的場合（例如：巴剎、小販中心、巴士轉換站等）；後十多年則轉移至對以英語為主要用語的行政人員的宣導。宣傳地點轉移至講英語為主的場合（例如：辦公室、政府部門等），這可以看出運動的目標與物件已經開始有所不同。

在講華語運動後期階段，新加坡出現了經過多年國民型雙語教育後的年輕一代，他們的年齡多半在 35 歲以下，是獨立建國以後才出生的新加坡華人（Singapore-Born Chinese, 簡稱 SBC），他們的華語能力較類似於華裔美國人（American-Born Chinese, 簡稱 ABC），跟在中國或臺灣等地單純在漢語環境中成長的華人差異極大。

如果將以往分別接受華校及英校教育的華人以黑白兩色作比喻，接受雙語教育後的年輕一輩，現在的華語能力比以前的英校生強，英語比以前的華校生流利，然而整體的華英雙語能力表現卻都不突出，這批介於中間地帶的雙語華人，我們可稱之為“灰色陰陽人”。

這一代年輕的“灰色陰陽人”能流利地以華語進行人際溝通，而且他們不像老一輩華人總是帶著無法擺脫的祖籍方言口音。無論在新加坡或到中國去，這些年輕人要與中國人進行日常生活交流並不成問題，即使他們所講的華語稱不上是字正腔圓的京片子，但他們所發出的標準語音，可能比福建省閩南人的華語還容易讓人聽懂。換句話說，新加坡新一代華人的華語在講的層次已達到中上水準。

然而，華文互聯網的崛起卻讓新加坡華人面臨全新挑戰。由於互聯網基本上是書面語的電子媒體，能聽能說但讀寫技能低的新加坡人，恐怕將淪為華文互聯網世界的文盲。

不少本地年輕人已在互聯網上架設高素質的英文網站，討論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種議題，在大學內部的網上交流，也多以英文為主。相對而言，雖然本地出版的華文版聯合早報網上讀者眾多，但有能力進入電子論壇發表意見的網友幾乎全是中港臺華人，能進入其間以華文交鋒的新加坡年輕華人屈指可數。

因此，未來新加坡華人必須在目前的華語口語基礎上，更上一層樓。“講華語運動”也應該易名為“提升華文運動”，新加坡華人不能再滿足於簡單的“講華語”能力，在未來的日子裏應該盡力提高閱讀及書寫華文的能力。

## 6. 三次華語教學改革及反思

從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新加坡的華語教學改革始終沒有停止過。1979年，時任副總理吳慶瑞領導的“教育研究小組”全面檢討華文教學，提出“分流制度”，奠定了新加坡華文教學的基本框架。在1992年到2004年的短短十二年裏，新加坡也先後進行了三次重大的華文教學檢討和改革。檢討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對後來的華文教學皆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 6.1 1992年王鼎昌領導的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

1992年，時任副總理王鼎昌領導的檢討委員會，開始全面檢討新加坡過去的華文教學政策。委員會向教育部提出一系列的華文教學改革建議，核心內容有：

- i. 將華文作為第二語文課程改為“華文”，將華文作為第一語文課程改稱為“高級華文”，以消除家長和學生因“第二語文”名稱而造成的不舒服心理。
- ii. 修訂舊的華文課程大綱，強調均衡的教學重點，即培養語言能力和灌輸華族文化與傳統價值觀並列。
- iii. 小學高年級增加授課時間，同時將公民和道德教育科改用華文講授。
- iv. 放寬中學快捷班學生修讀高級華文和中華文學的限制。

《1992年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報告書》所提出的華文教學改革建議在當時是合時的，希望借此提升新加坡學生的華文科整體水準，彌補因分流制度帶給學生造成學習高級華文的困難。同時，對教師士氣、家長和學生的信心都起到提升的作用。

但是，在協助以華語為家庭用語的學生提升華文能力的同時，卻對以英語為家庭用語的學生在學習華文可能面對的困難和障礙不夠重視，以致造成一些學生的學習負擔過重。這些矛盾在日後華文教學中逐漸顯現出來。

### 6.2 1999年李顯龍領導的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

由於新加坡華族學生的家庭常用語發生重大變化，例如1998年華族小一新生中，以英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學生已達到40%，在短短10年裏增加了一倍。在這種情況下，要維持普遍高水準的華文教學目標變得困難重重。許多學生感到華文教材的內容和語言能力要求皆超出可理解和掌握的程度。因此，1999年時任副總理李顯龍領導的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在經過全面調查研究後，提出應該採取務實可行的教學策略，為不同家庭用語的學生“量身訂制”適合他們語言能力水準的華文教學目標和內容。

委員會重申新加坡華文教學中灌輸華族文化價值觀的目標不變。如果必要的話，可以考慮用英文來進行輔助教學。在語言能力目標的設定上，委員會認為應該以務實的態度，為不同能力、性向的學生定下可達性的語言能力的教學目標。檢討委員會提出主要改革建議如下：

- i. 放寬小學修讀高級華文的條件，以鼓勵更多學生修讀高級華文。學生在小四分流考試中華文成績一等，英文和數學二等即可修讀高級華文。而非過去的三科都必須獲得一等。
- ii. 開設第十所特選中學，並進一步放寬修讀中學高級華文的限制；同時在第三所初級學院開設“華文特選課程”。
- iii. 開設華文B課程，以滿足較低水準學生學習華文的需要。委員會認為，與其忽視他們，讓他們因長期遭受挫折而厭惡華文，不如為他們設計一個較淺白、實用、著重口語能力的華文課程。

《1999年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報告書》提出的華文教學改革建議是務實而平衡的，不僅靈活化解了提升華文水準、維繫華族文化傳統與客觀社會語言環境不利的難解矛盾，同時形成以華文為主體，高級華文和基礎華文/華文B為兩翼的三層次華文課程體系。

### 6.3 2004 年黃慶新領導的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

新加坡教育部在 2004 年 2 月由前教育部提學司黃慶新領導成立“華文教學改革委員會”，並於同年 11 月向國會提呈《華文教學改革白皮書》。《白皮書》除了進一步強調雙語政策是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基石外，也延續了《1999 年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報告書》中因材施教的改革思路，其目的在於保持學生對華語的長久興趣，讓華語成為他們的生活語言。

委員會認為，新加坡學生的華語水準已出現分化的情況。根據教育部委託福布斯研究所進行的調查顯示：以英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小六學生認為華文難學的人數高達 77%，而以華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小六學生認為華文難學的比例只有 36%，差異相當顯著。因此委員會建議採用差異教學法，為來自不同家庭常用語、語言能力的學生“量身訂制”適合他們語言能力水準的華文課程。《白皮書》主要的改革建議有：

- i. 從小學一年級起就採用單元教學模式，將課程分為導入單元、核心單元和深廣單元以滿足不同程度學生的需要。
- ii. 學校可根據學生的語言程度，在教育部統一華文教材以外，選編合適的校本教材和輔助教材。
- iii. 對一般修讀華文的學生，在語言技能培養上採取先聽說、再讀、後寫的分段處理，而非聽說讀寫齊頭並進。對修讀高級華文的學生，仍讓他們繼續有效地掌握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能，全面提高語言能力。

2004 年華文教改可以看作是 1999 年華文教改的延續和補充。最顯著的特點是將因材施教的政策向下延伸到小學階段，同時完成華文 B 課程框架的建構。到此為止，新加坡小學、中學和初級學院都有了完備的差異性課程。主流課程和附加配套課程與三級華文教育體系相輔相成初見端倪。

《白皮書》的華文教學改革建議具體且操作性強，許多已經付諸實施。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遇到一些難題，如不同課程之間的銜接和配合問題，教學時間安排以及教學法和教材改進等問題，都有待教育部相關部門採取相應的配套措施妥善加以解決。

### 6.4 關於特選中學的反思

為解決本地華族學生華語水準日漸低落，擴大特選中學的數目及增加修讀高級華文學生人數，是培養本地“華文精英”的策略之一。但從上世紀 90 年代以後，特選中學學生已改變接受全面的英文教育。而在華文課程的設計上，許多非特選中學，包括自主中學和自治中學，也和特選中學一樣開辦高級華文課程。換句話說，除了特選中學保存所謂的華校傳統外，原本獨佔的高級華文課程已經失去優勢。

而從畢業生的出路來看，三分之二的新加坡公共服務委員會獎學金得主多來自非特選中學，這也與新加坡年輕行政官的來源比例相同。這些資料顯示：非特選中學才是培養新加坡主流精英的搖籃。特選中學既然無法吸引到大部分華族的優秀學生，而他們的畢業生是否就能成為鞏固中華文化與傳統價值的“華文精英”已是個問號。

李光耀曾舉新加坡駐中國前大使鄭東發為例，認為即使他接受 12 年完整的華文教育，遇見中華文化根基深厚的中國人時仍相形見绌。而現在將“華文精英”定義為只比一般華族學生多修讀一年“高級華文”科的特選中學學生，他們只接受過每週三四小時的中學華文課程，加上慶祝傳統華族節日、相聲朗誦等課外活動的有限語言訓練，卻期待他們未來能到中國和其他使用華語地區做生意，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這種培養“華文精英”的策略實在是言過其實。

### 6.5 關於華語 B 課程的反思

華文 B 課程是 1999 年由時任副總理李顯龍領導的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提出的，2001 年由教育部推動實施。推出華文 B 課程的目的是要協助學習華文有困難的中學生提高學習信心，消除他們學習母語的心理障礙。

前教育部提學司黃慶新在 2004 年提呈的《白皮書》指出：華文 B 課程縱使內容不能達到很高水準，但總比硬逼學生學習他們能力不及，以至最後全盤放棄要好。因此，教育部決定放寬條件，提早從中一開始提供華文 B 課程。

然而，華文 B 課程在實際教學中卻遇到一系列矛盾和困難：

i. 《中學華文課程綱要》強調華文 B 課程“著重培養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教學重點在聽、說、讀能力的培養，以及傳統文化的傳授”，卻又規定“實際教學時間分配：聽說：35%、閱讀：35%、寫作：15%、文化活動：15%”。教學時間分配不符合教學重點，寫比重雖低，但是他們仍然無法應付。

ii. 中四華文 B 試卷由寫作 (20%)、理解與語文用法 (40%)、聽力口試 (40%)組成，與中四華文試卷測試形式近似。兩者皆涵蓋語言四技的測試，差異僅在語言四技的比重。如果以“著重培養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華文 B 試卷應該重新設計。

iii. 如果選讀華文 B 課程的學生程度提升後，是否設計有回流的管道？這個銜接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

華文 B 課程僅為過渡性的治標方案，治本方式應從小學開始就全面改革華文教學，針對不同家庭語言背景的學生設計特定的教材及教學法，以制止修讀華文 B 課程學生人數的持續增加，同時也應引導更多學生回歸主流，並能順利完成一般華文的教育。

因此，華文 B 課程的未來工作應包括：

i. 華文 B 課程應針對講英語家庭學習者的特質設計相應的華文教材與教學法。教學重點擺在讓學習者未來可實際地接收瞭解華文資訊和進行口語交際，所以集中在聽、說、讀三技訓練即可。

ii. 華文 B 課程教師應該能華英雙語並用教學法，並接受華語作為外語的新型教學法培訓。

iii. 既然修讀華文 B 課程的學生為華文作為外語的學習者，因此試卷可參照美國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華語作為外語考試”、中國“漢語水準考試”的測試形式，甚至可以考慮有些項目讓學生以英語作答，以測試其理解、翻譯的能力。

## 7. 新加坡華語教學的新方向

### 7.1 雙語並用華語教學實驗計畫

對以華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學生而言，華語屬於第二語言教學；對以英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學生而言，華語屬於外語教學。為協助日益增多的英語家庭背景的華族學生擺脫學習華語初期面臨的困境，教育部 2002 年針對這些學生學習華語的特殊需求，聘請我擔任學術顧問，在四所小學進行為期兩年的雙語並用華語教學實驗計畫。這四所實驗學校——聖安德列小學、聖彌額爾小學、英華小學（經禧）和美以美小學的學生，九成以上來自講英語的華族家庭。

雙語並用華語教學實驗計畫是以學習者的家庭語言背景為考量，採取的靈活且務實華語教學法。這種“對症下藥”的雙語並用華語教學法，希望幫助講英語家庭學生在友善的情境下，在初始階段解除華語難學的心理障礙，並拉近師生距離。同時，教師抱著同情與支持的態度，瞭解學生學習華語的困難所在，從而提供有效的學習策略。

雙語並用華語教學法是過渡階段的漸進式教學策略，打破原來在新加坡華語科課堂教學不得使用英語的禁忌，允許教師及學生在初始階段以英語為輔助教學語言，而後隨著學生華語程度的提高，過渡到只使用華語進行教學的階段，達到終極學習華語的目標。

在這個實驗計畫開始階段，新加坡講華語與講英語族群曾對此課題出現極端支持及反對的兩派爭議，並在中英文媒體掀起軒然大波。但兩年後經過教育部計畫署研究與評鑒組的獨立調查，證實這個實驗計畫得到實驗班學生、教師、家長、學校各方極高比例的正面回饋，終以具體事實證明其可行性與有效性，教育部因此決定把雙語並用華語教學法從原本的四所實驗小學推廣到十一所小學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04b)。

### 7.2 雙文化課程

為新加坡培養高層次的華語人才一直是政府關注的課題，而開設“雙文化課程”的目的是希望培養一批具備英華雙語能力，同時熟悉中國又有世界觀的本地華族學生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04c)。

華僑中學、南洋女子中學、德明政府中學和立化政府中學是率先開辦雙文化課程的四个特選中學。這個課程為期四年：在中三、中四階段，學生除了選讀高級華文外，也可以選修中華歷史和哲學；到了初級學院一、二年級階段，學生可以選修華文、中華文學以及中國通識。

修讀此項課程的學生將獲得教育部頒發特別輔助計畫學校獎學金，同時也豁免繳交學費。此外，他們可領取津貼到中國參加長達半年的浸濡課程，以及在歐美國家接受為期兩周的短期浸濡課程。

## 8. 華語在新加坡的新機遇

中國的崛起，凸現了華語的經濟價值，但仍絲毫不能動搖英語在新加坡的強勢地位。李光耀在 1997 年全國大選期間曾表示：“即使因為中國的富強而使華語成為 30 年後的國際語言，新加坡也要繼續保留英文作為工作語言。因為新加坡畢竟是個東南亞國家，不能讓鄰國產生新加坡是中國海外基地的疑慮。”由此可見，選擇英語作為主導語言背後還有重要的政治考量。

雙語政策決定了華語在新加坡的從屬地位，也預示了所有的華語政策的調整都只是改良，而非改革，而且必須是在不取代英語統治地位的前提下進行的。如果不能站在這個立足點上討論，所有華語教學的改革建議和主張都是不切實際的。

再說，雙語政策也為華人保留中華傳統文化和學習族群“母語”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雖然華語在新加坡學校只是單科，教學時間也有限，但卻以必修科進入國家主流教育體系中。因此，所有新加坡華族子女在中小學基礎教育階段，都能夠修讀至少 10 年的華語課程，這在除了全球華語內圈的中國大陸與臺灣“中原”區以外的任何國家都是做不到的。

新加坡擁有相對優勢的英語和華語環境，東西方文化也在此彙聚。這使新加坡華人有機會游走各地，左右逢源。因材施教的雙語教育政策也創造了培養雙語人才的肥沃土壤。如果新加坡華人能夠充分利用雙語優勢，未來的出路依然是可以期待的。

### 8.1 打造新加坡成為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研重鎮

新加坡目前仍然擁有良好的雙語環境，華文媒體和英文媒體都很活躍，華族家庭語言背景也各不相同，既有以華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學生，也有以英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學生，這都為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提供了多樣性的研究樣本和“實驗室”。因此，新加坡華語教學學者應該充分利用這一“天然”優勢，在華語教學研究上下功夫，努力提升自己的研究水準，使新加坡成為海外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研重鎮。

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中文系作為新加坡唯一的華文師資培訓基地，近年來為新加坡中小學培養了大量的華文教師。這些教師接受的專業訓練都與中港臺的華文教師不同，加上他們在教導新加坡家庭語言背景各異的學生後所累積的獨特教學經驗，在全球掀起華語學習熱潮的今天，這樣一批擁有雙語能力的高素質的華文教師，相信在世界各地都是廣受歡迎的。因此，新加坡華文教師培訓機構十分有希望成為培養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專業教師的重要基地。

### 8.2 打造新加坡翻譯服務業

新加坡華族學生的華文整體水準雖然正在下降，但在特選學校中，仍活躍著一批兼通雙語的學生，這批學生的華語聽說讀寫四項技能均能達到中高水準。他們或許把英文文本翻譯成中文文本的水準並不高，但將華文文本翻譯成英文文本的流利度上，本地學生的雙語優勢遠遠超過中港臺的學生。

由於翻譯是一種對雙語要求都很高的專業，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程度加深，中英翻譯人才的需求量將越來越大。新加坡學生良好的雙語能力是他們成為翻譯人才的良好條件。新加坡教育當局應該充分利用此優勢，在中小學開設基礎翻譯課程，訓練學生掌握基本的翻譯技巧，並在大學校進一步開設翻譯專業課程。未來將新加坡打造成世界翻譯人才培訓基地與推動新加坡成為翻譯服務業區域樞紐的遠景，應是指日可待。

## 參考文獻

- 華語教學改革委員會(1991)《華語教學改革委員會報告書》，新加坡：教育部。
- 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2004)《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報告書》，新加坡：教育部。
- 吳英成(2003)〈全球華語的崛起與挑戰〉，《語文建設通訊》第73期，頁46-54。
- 吳英成(2004)〈打造新加坡翻譯服務業〉，《聯合早報》，7月19日。
- 吳英成(2006)“中、港、新三地漢英語言政策與語言教育比較：全球語言視角”，論文發表於第三屆兩岸四地語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理工大學，5月11日-13日。
- 王宗炎編(1988)《英漢應用語言學詞典》，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周清海、吳英成(1999)〈新加坡講華語運動：第20年的新起點〉，張曉山編：《立說傳薪風雨人---慶祝詹伯慧教授從教45周年》，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192-199。
- Cooper, Robert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avi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sold, Ralph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Goh, Yeng Seng (1999) Challenges of the rise of global Mandari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4.3: 41-48.
- Ho, Wah Kam and Wong, Ruth L. Y. (eds.) (2000) *Language Polici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mpact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Next Decade*. Singapore: Time Academic Press.
- Kaplan, R. and Bakdauf, R. B.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Pte Ltd.
- Leow, Bee Geok (2001)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0 Statistical Release 2: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Singapor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1999) “Ministerial statement by DPM BG Lee Hsien Loong on Chinese language in schools in parliament”,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ess Release*, 20 January.
-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04a) “Refinements to mother tongue language policy”,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ess Release*, 9 January.
-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04b) “Bilingual Approach (BA)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primary level extended to seven other schools”,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ess Release*, 23 February.
-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04c) “Nurturing a core of students with advanced knowled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ess Release*, 3 September.
- Richards, Jack C., Platt, John & Platt, Heidi (1998)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 Applied Linguistics*. Hong Kong: Addison Wesley Longman China Ltd.